

賴慶鴻 著

文史哲學集成

董仲舒政治思想之研究

文史哲出版社 印行

序

學問無止境，以莊子之知尚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衡之中國歷代諸子學說之龐雜浩瀚，以及後世印刷之發達，欲窮其「知」，豈止「殆」而已矣。

董仲舒爲西漢武帝時代之大儒，爲先秦政治思想演變至西漢因襲時期之關鍵性人物，其思想宏達博瑋，自其力主「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後，諸子百家之思想隱晦不彰，儒家躍居獨尊主導地位，對中國思想形態之影響甚深，實不僅爲融合先秦思想之典型人物，亦爲儒家政治學術思想之巨擘。其有功於儒家，猶儒家有功於中國，謂爲中國道統文化之發揚者，洵非溢美。

本書研究董仲舒之政治思想，以春秋繁露、史記、漢書及其對策、書論、賦頌、文集爲主要資料，並參佐當世及以前與其政治思想有關之記載，與後人著作之引申和評述。爲力求研究態度之客觀及無所偏失，多方旁徵博引，以使理論與史實兼顧。其中雖偶語涉稱羨或評駁，亦皆出自內心對其思想之體認，非敢故意抑揚損益，妄加臆斷。

董仲舒之著述爲其一生智慧之結晶，故在研究上無法一蹴而成。著者沐浴木柵春風十數載，深知

欲開廣知識與學術之領域，當「再接再厲，精益求精」。惟以秉賦駑鈍，學殖荒落，以樗櫟之資探研無垠之思想，匪特見聞未廣，或恐紕繆殊多，倘蒙學界高明，惠予賜正，「雷霆與雨露，一例是春風」。

本書參考資料之書目詳列於書後，俾便查閱。著者撰寫本書時，承蒙東吳大學前文學院長王兆荃教授、台灣大學教授孫廣德博士之指導，及內子林芳蘭女士之協助，特爲誌謝。

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

賴慶鴻序於台北市木柵寓所

提要

本書之內容分爲導論、第一章至第六章、結論。

導論：主要說明董仲舒政治思想之性質與義蘊，俾對其思想先有一概括性之認識。

第一章：董仲舒之生平與著作。仲舒生於西漢初，據考證約在惠帝與呂后年間。景帝時爲博士，善治春秋，學士多師尊之。武帝卽位參與賢良對策，任江都相，從此爲武帝所重，位未鼎足，知在公卿之上。中廢爲中大夫。因爲人廉直，公孫弘嫉之，乃薦爲膠西相，恐久獲罪，病免歸家，以修學著書爲事，年老以壽終於家。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而今所傳者，除漢書所載等外，要爲春秋繁露一書。春秋繁露之真僞問題，論者頗多，惟莫衷一是。吾人以爲其書爲後人收輯而成，縱或非全由仲舒所著，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作爲研究其政治思想之用，當無不可。

第二章：董仲舒政治思想之時代背景與淵源。西漢初七十餘年間，正爲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形成之過程，亦正是道、法、儒三家思想爭勝之時期。道家思想之全盛是在高祖至文帝時期，其間採「清靜

無爲」，與民休養生息之政策，府庫充盈後，思圖以振作；文景時代申韓刑名之學興起，法家得勢。及自武帝即位，遂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儒家自此定於一尊，成爲中國學術思想之主流，仲舒處於道法儒爭勝之時代，自亦深受時代之影響，而其思想淵源却以儒家及陰陽家者爲主，故漢書謂仲舒爲「始推陰陽，爲儒者宗」。

第三章：董仲舒論人性與正名。仲舒論政以人性爲起點，從人性論可了解其論政之態度。孟子主張性善，於爲政重明倫教化；荀子主張性惡，其論政重禮法制度；仲舒謂性有善質而未全善，故重仁義禮智之王教，爲政則以禮匡正，故所居而治。至其正名，認爲「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欲正其名則須法天地，蓋「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仲舒本天地以正名，是其創意，其正名之主要作用在伸春秋大義，而春秋大義在張三世、存三統、異內外。

第四章：董仲舒論天人關係與君權神授。天人觀念乃淵源於古代之神權觀念，殷商人便絕對信天，以天意決定一切。仲舒特別強調天人關係，本章分三部分述之。一、天道至上：主要說明天「至高無上」之地位，因「天高其位」，所以「以君隨天」，君主當承天意以從事。天並具有性格，以仁爲心，任德不任刑，君主當效法天之所爲，否則天命奪之。二、天人相與：主要說明「王道參天地」，而爲人君當重視天道之變化，天可感人，人亦可感天，天人相應相通，君主即當以天示之災祥，修正政事。而仲舒是以「物」和「數」作爲相應之基料，並以「君」或「聖人」作爲通天之橋樑。三、君權神授：仲舒既以「天」爲萬物之祖，故視天爲一切權力之泉源，君權由於神授，君主當知天之恩，

行仁政以報天。仲舒將君權置於天權之下，其主要用意限制君權之無限擴張，此與西方君權神授說迥異。

第五章：董仲舒論臣民與治術。仲舒認為臣爲君之輔，民爲君臣之所重，而臣民不可無君，故君臣民皆爲政治上不可分之實體，缺一不可。仲舒之論治術分行政、經濟、社會三方面。行政方面：主張任用賢人，賞罰嚴明。經濟方面：主張均富，官宦不與民爭利，防止土地兼併，薄賦，以安定民生。社會方面：主張省繇役以寬民力，反對奴隸制度，並重文德卑威武。

第六章：董仲舒政治思想對當世之影響。主要分對思想方面之影響與政策方面之影響。前者仲舒之影響是造成武帝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中國學術思想以儒術爲主流。又因仲舒倡天道至高，影響武帝等尊崇天道，惟最後却流於玄奧。後者仲舒之建議主張，對武帝產生實際政策上之影響，如興太學，置五經博士，郡國舉賢良等，而其後諸帝之滅除奴婢，廢鹽鐵官，重農事等，與王莽之土地政策等亦多源於仲舒之主張，可見仲舒之政治思想對實際政治亦發生相當大之影響。

結論：主要分五點檢討仲舒政治思想之內涵及特色。一、政權轉移之方式：以和平方式爲主，征伐乃非常態。二、君主專制之理論：後世謂仲舒爲君主專制之理論奠基，其實尊君只是仲舒所主張之長久之經，此外仍主張「暴君可伐」，故仲舒之尊君與法家之尊君截然不同。三、獨尊儒術之利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必有其利弊，如其利鉅，其弊微，則尊之又何妨。四、天人合一之流衍：天人合一說流於圖讖乃非仲舒始料所及，惟其說歷經魏晉與唐已有變化，尤至宋元，因已吸融釋道二家之

精髓而成爲天人性命說之新儒學。五、聖王政治之理想：仲舒理想中之王乃人性至善而知天意之聖人，故主張君主當「奉天而法古」，以達天下和洽郅治之美境。



作者簡歷：

賴慶鴻

男性，民國廿九年出生。

臺灣省臺南縣人。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博士。

考試：五十八年全國性高等考試優等榜首。

著作：決策判斷之分析、天人感應、荀子禮分思想之研究、

董仲舒政治思想之研究……等。

現職：中央信託局一等專員兼科長。

董仲舒政治思想之研究 目錄

序	一
提要	一
導論	一
第一章 董仲舒之生平與著作	九
第一節 董仲舒之生平	九
第二節 董仲舒之著作	一三
第二章 董仲舒政治思想之時代背景與淵源	三三
第一節 時代背景	三三
第二節 思想淵源	五九
第三章 董仲舒論人性與正名	九三
第一節 性有善質而非善	九七

第二節	人性待王教然後善	一〇五
第三節	正名以伸春秋義	一一一
第四章	董仲舒論天人關係與君權神授	一三七
第一節	天道至上	一三八
第二節	天人相與	一五二
第三節	君權神授	一九二
第五章	董仲舒論臣民與治術	二一三
第一節	論臣民	二一三
第二節	論治術	二二八
第六章	董仲舒政治思想對當世之影響	二四七
第一節	思想方面之影響	二四七
第二節	政策方面之影響	二六二
結 論		二七五
參考資料		二八五
壹、專書		二八五
貳、論文		二九四

附錄 西漢建元表·····	二九七
---------------	-----

附表：

表一 三統說制度表·····	一一一
表二 三統、四法、五德說關係表·····	一二三
表三 四法制度表·····	一二四
表四 王莽依三統說及五德說改制表·····	一二六
表五 五行時政綱領表·····	一六二

導 論

學者對政治思想有不同之稱謂，有人稱之爲政治理論或政治理想，亦有人稱之爲政治哲學或政治文學，更有人稱之爲政治意見。可見政治思想之內涵，是隨各人之研究態度與旨意而定，並無完全一致之見解（註一）。不過，政治思想無論如何被稱謂，其內容却必然與政治有關，否則便不能屬於政治思想之範疇；此一與政治有關之內容，即爲政治思想所應有之特色。

政治思想是時代之產物，是爲解決政治問題而發生；而政治思想家也大都具有不甘寂寞之性格，其所提之主張或理想，完全是基於對時代之一片熱誠。不論其態度是消極或積極，是悲觀或樂觀，亦不論其表達方式爲如何，均爲對時代有所感而發，因此其反饋於時代之思想，無論是否有助於時代，然常反應當時之政治問題，而具有相當之價值，此即是政治思想可貴之處。

董仲舒爲漢武帝時代之政治思想家，其一生曾遭遇過許多寂寞與坎坷，但其對時代却具有無比之熱誠，因此，其被尊稱爲「儒者宗」，乃非偶然，而是由其不平凡之表現有以致之；此不平凡之表現，即是其政治思想之特質。

仲舒之政治思想是以論人性出發，其謂「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註二）。人如欲成其善性，則需從其「善質」，待「外教」之後，始能達成。而其所謂之「善質」略似孟子所言之「善端」，而「外教」即爲荀子所謂「其善者僞也」之「僞」。前者之「善端」爲天生而有；後者之「其善者僞也」之「善」，係由外鑠而成。故仲舒之說乃治孟荀兩說爲一爐，並更發己意，謂「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爲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註三）。並吸融「陰陽家」之思想，闡揚天道之論，而蔚爲一家之言。仲舒之思想即由此天道與人道之論，益見其幽微與博深，並成爲創時代之巨構，爲漢代政治思想大放異彩；而儒家之能自武帝後定於一尊，形成中國政治學術思想之主流，仲舒居功甚偉。

儒家思想所以能成爲中國思想之主流，仲舒之功固不可沒，然主要原因亦當在其學說內容之博大精深與可大可久，故歷經秦之「焚書坑儒」，依舊能由衰而盛，更爲風采。法家雖因秦而顯，然亦隨秦之沒而微，其原因是在商、韓之說多弊。梁任公云：「法家之爲利也顯而驟，其流弊多；儒家之爲利也隱而長，其流弊少」（註四）。其於儒法利弊之論斷確有見地。

秦亡之後，高祖知秦之失，故於入關後，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爲關中王。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註五）。此一政簡刑輕之政策，遂成爲有漢遵循之傳統，而道家思想因緣成爲當世之顯學。

道家思想「清靜無爲」於天下，歷經孝惠、呂后而不衰，及至孝文帝即位，有議欲定禮儀，亦因「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故罷去之」（註六）。儒家之術歷漢初數十餘載，均居於野，未爲所重，迨至武帝，王國之世摧毀，列侯亦復削弱，天子獨攬大權，君權高漲，在此之時，如何限制君權，而又不危及君權，惟有假手於皇天。皇天思想自古卽已有之，殷商人便絕對信天，以天意決定一切（註七）。惟如何運用皇天，以之限制君權，則史上尙未有一系統之思想，於是「儒家就借用陰陽家的學說，使人主看到陰陽錯逆，悚然憂懼，以爲上天震怒，而謀所以補過之道」（註八）。而「首將儒家與陰陽家兩種學說合併起來的，則爲武帝時的董仲舒」（註九）。

董仲舒以治春秋著於世，其於武帝賢良對策中，假陰陽錯逆災異之說，揭發儒家仁愛教化之術，並以天道爲君道之本，使「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註一〇），課君主以尊天愛民之責，俾君權不離皇天正道與愛民之心。武帝對仲舒之重視，更使儒家之術因仲舒而顯，而仲舒又因會思潮，吸融陰陽之學，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學士多師尊之。

仲舒之政治理想爲古代五帝三皇之政治，因當時之政治社會「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妬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註一一），故仲舒於武帝賢良對策中，一再推崇聖王之治，意欲使武帝效法聖賢，以達民德修睦，天下和洽之目的；而欲達此一目的，卽提出其具體之主張多種，其中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爲最要。

仲舒之倡尊崇儒術，其目的在使儒學定於一尊，俾能師同道，人同論，百家同方，天下言論思想歸於一。雖然，自茲以往，儒學之尊嚴迥然百流，成爲當世之顯學，亦乃時勢所趨。蓋儒術之不興，至武帝時已百有餘年，以其思想之宏博，治術之週備，人才之濟濟，早當成爲學術思想之主流，只爲形格勢禁，故未爲所用，而武帝大一統之局形成，統一思想言論亦復勢在必行，此時潛存已久之儒家遂趁勢一躍而起，文景所曾用之道法之術遂退居於後，而儒術之顯，遂因朝野皆得勢，更有非定於一尊之勢不可。

仲舒之思想淵源主要爲儒家與陰陽家，其以治春秋著於世卽爲秉承儒家之術而來，而其始推陰陽卽受陰陽家之影響。陰陽家創自於戰國之鄒衍，而鄒衍陰陽五行說之興蓋在其「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稱行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註一）二。其學說系統化之後，仲舒卽在其思想學說之影響下，倡「天下相與」、「符命災異」、「陰陽五行」等思想主張。後世有人以其思想由附會而轉入怪異（註一三），其實仲舒之思想要在假陰陽五行以推揚儒術，雖有部份怪異，亦無礙於其中心思想。

仲舒承襲鄒衍陰陽五行說之思想，並與政事作更嚴密之結合，認爲政事之運行與陰陽五行具有密切之關係，故曰：

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迹陰陽終歲之行，以觀天之所親……聖人之治亦從而然（註一四）。

仲舒將陰陽五行，配合人事之變化，而特別發揮「天人相應」之理論，且將「天」置於至高無上之地位，用以加強陰陽五行說之效果，故「法天」乃爲一切之先決條件。因「天高其位」，且爲「萬物之始祖」，其降福降禍，以人之行爲是善是惡爲定，故尊天法天乃君主之德，況君主之權源於天，不法天則無以爲王。仲舒曰：

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博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

順命也（註一五）。

仲舒之天道觀亦承襲古之天道觀，認爲「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註一六）。仲舒所言之「以人隨君，以君隨天」，其意應不僅尊天法天而已，尙含有「尙德」之意，因人隨君，君隨天，即是一種無形之政治規範，亦可謂爲政治道德，此與鄒衍陰陽五行說之中心觀念並行不悖。惟仲舒特發揮「以君隨天」，「屈君而伸天」之旨，將君權置於天權之下，「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註一七），故天居於君之上。不僅如此，君之爲君，乃承天意以爲民，此更課君主以爲民之責，故曰：

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註一八）。

仲舒此一思想多少是秉承前人之思想而來（註一九）。君主上須承天意，下須爲民，則君主之權力來源與作用，既非由己，又非爲己，此即是仲舒以天權高於君權，而君權必須秉承天意以爲民之思想特

色。

仲舒重天道，爲貫徹儒家仁政思想於天道觀念中，故謂「仁，天心」（註二〇），「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註二一）。仲舒先以天心爲仁，而後以天道監督君道以行仁道，其所倡「天人相應」之災異說，即藉示天意之仁，使君主改過遷善。

仲舒身處君主專制政治環境下，中央集權之勢已成，深知君權高漲，頗難予以有效之約束，故其強調天人之關係，將神秘不可知之「天」，化爲有意志之天，以監臨君主，君主在仲舒所言之「天」下，不僅應留意天象地變之災異，尚須隨時自省以知變，以應天道之仁。依仲舒之言，天出災異，是君主失道而不知自省求變所致，有德之仁君，爲保有上天賦予之權力，並表示敬天，當愛民以修仁道。仲舒以天居於權力之主宰地位，並課君主以治政爲民之責任，在西漢君主擁有絕對權力之政治體制下，不失爲制衡君權，發揚仁道之良好途徑。

如仲舒這樣關心時代政治問題之思想家，自然不會只去空談人性、天道、仁義，對與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之許多實際問題，諸如農事、賦稅、鹽鐵、刑罰、奴婢等，亦均擬具政策，或提出具體辦法，以表示其解決之意見。

綜觀仲舒一生廉直爲仁，以治春秋爲儒者所宗，吸陰陽五行說，融儒家仁義禮之精神，倡天權高於君權之論，以正名仲春秋義，重申暴君可伐之思想，實爲漢代君主專制政治之暮鼓晨鐘。漢武帝雄才大略，一生崇尚儒術，並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卓然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使儒家成爲獨尊之勢，